

【中西学术丛书】

温华——著

# 外国文学研究 话语转型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温  
华 / 著

# 外国文学研究话语转型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中西学术丛书】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文学研究话语转型 / 温华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4. 12  
ISBN 978-7-5473-0738-0

I. ①外… II. ①温… III. ①外国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59264 号



## 外国文学研究话语转型

---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20 毫米 1/16  
字 数: 250 千  
印 张: 16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738-0  
定 价: 42.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021)52069798

# 目 录

|                              |        |
|------------------------------|--------|
| 绪论·····                      | ( 1 )  |
| 第一章 外国文学研究话语的创建与变异·····      | ( 13 ) |
| 第一节 民国时代外国文学的多元话语·····       | ( 13 ) |
| 第二节 “十七年”外国文学一元话语的创建·····    | ( 18 ) |
| 一、1949—1955：全盘苏化·····        | ( 21 ) |
| 二、“百花”开放：短暂的多元化·····         | ( 23 ) |
| 三、阶级话语一曲独奏·····              | ( 25 ) |
| 第三节 “文革”十年外国文学话语的变异与失声·····  | ( 31 ) |
| 第二章 外国文学研究话语的重建与转换·····      | ( 33 ) |
| 第一节 阶级话语与批判模式的滞留与退隐·····     | ( 34 ) |
| 一、转折与过渡·····                 | ( 34 ) |
| 二、变与不变·····                  | ( 36 ) |
| 三、新旧话语并存·····                | ( 38 ) |
| 第二节 人道主义讨论和现代派文学论争的话语分析····· | ( 42 ) |
| 一、对人道主义的呼唤·····              | ( 43 ) |
| 二、“现代派”的转化·····              | ( 48 ) |
| 第三节 西方新理论话语的引入与影响·····       | ( 53 ) |
| 一、新旧理论的选择·····               | ( 54 ) |

|                             |         |
|-----------------------------|---------|
| 二、新理论话语对批评实践的影响 .....       | ( 59 )  |
| 第四节 期刊专栏与话语热点 .....         | ( 71 )  |
| 一、期刊定位与外国文学新秩序 .....        | ( 72 )  |
| 二、“比较文学”与“走向世界” .....       | ( 76 )  |
| 三、“20 世纪外国文学走向”大讨论 .....    | ( 85 )  |
| 第三章 西方话语中心的突显与质疑 .....      | ( 92 )  |
| 第一节 “延续性问题”的再探讨 .....       | ( 95 )  |
| 一、“延续性问题”和“新问题”、“新话语” ..... | ( 95 )  |
| 二、“20 世纪外国文学”再讨论 .....      | ( 99 )  |
| 三、“十七年”话语传统的“昙花一现” .....    | ( 103 ) |
| 第二节 西方话语中心的形成 .....         | ( 107 ) |
| 一、理论译介特点 .....              | ( 107 ) |
| 二、叙事学与后现代主义的接受历程 .....      | ( 112 ) |
| 三、作家作品研究版图 .....            | ( 121 ) |
| 四、理论与批评的时间错位 .....          | ( 128 ) |
| 第三节 西方话语与本土意识 .....         | ( 131 ) |
| 一、“殖民文学”论争 .....            | ( 131 ) |
| 二、“全球化与民族化” .....           | ( 137 ) |
| 三、“理论”之争 .....              | ( 141 ) |
| 第四章 理论退热、文化转向与本土话语建构 .....  | ( 147 ) |
| 第一节 理论退热与话语多元 .....         | ( 147 ) |
| 一、学术繁荣与理论退热 .....           | ( 147 ) |
| 二、多元化研究模式 .....             | ( 154 ) |
| 三、批评实践个案分析 .....            | ( 157 ) |
| 第二节 文化研究：理论探讨与批评实践 .....    | ( 167 ) |

|                       |       |
|-----------------------|-------|
| 一、理论探讨 .....          | (168) |
| 二、批评实践 .....          | (174) |
| 第三节 建构本土批评话语的尝试 ..... | (191) |
| 一、文化诗学 .....          | (193) |
| 二、作为“方法”的古典西学研究 ..... | (195) |
| 三、文学伦理学批评 .....       | (198) |
| 结束语 .....             | (203) |
| 附录 .....              | (206) |
| 主要参考文献 .....          | (237) |
| 后记 .....              | (248) |

# 绪 论

中国现代学术体系自晚清初创以来,不断发展完善,至今已有百年历程。在诸多学科当中,“外国文学”无疑是非常特殊的一个部分。百年来,外国文学作品和西方文学理论的译介一直为中国文学界、学术界提供着丰富而重要的话语资源,推动了中国学术乃至整个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但与此同时,它又是整个体系中一个特别边缘的学科,围绕外国文学进行的学术研究长期处于“引进、介绍、描述”的“学习时代”,无论在本国还是国际学界,学术地位皆不被重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人文学科皆兴起学术史研究热潮,历史学、文艺学、古典文学及现代文学各学科都推出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系列学术史丛书及专著。相比之下,外国文学界的脚步稍显滞后,近十年来始有各语种及经典作家的学术史研究出现。鉴于此,本书尝试以学术话语转型为线索,对1949年以来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历史进行整体性回顾与反思,通过梳理这一时段内理论研究、作家作品研究模式及期刊话语热点的变化,勾勒外国文学研究学术话语转型的过程,揭示转型过程的复杂、多样与矛盾,探讨不同阶段外国文学秩序的建构过程,以及话语转型的学术史意义。最终,希望能够借此呈现外国文学研究之于中国学术体系及中国文化建设的价值。

## 一、外国文学研究整体反思的历史及现状

所谓“整体性”,有两重指向:其一,本书考察的对象不是各国别、各语种的研究历史,而是作为整体的“外国文学”的学术历程;其二,本书无意于面面俱到

地梳理这一时期的学术得失,而是力求清晰呈现这一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话语模式的变与不变。

目前学制规定,“外国语言文学”为一级学科,由诸语种文学的二级学科和名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二级学科组成。前者分布于高校各语种教学之中,后者于中文系主干基础课中存在。历史上,“外国文学”的教育实践也一直以两种方式存在:一是各语种文学,一是整体的“世界文学”。后者并非前者的简单集合。两种外国文学教育实践的存在曾经对这一学科的发展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sup>①</sup>因此,“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包括将外国文学学科作为一个整体的研究,也包括对各国别文学研究的梳理,对经典作家作品和文学流派、思潮研究的研究。近年来学界对于后者的研究已经较为可观,时有佳作出现,例如陈建华主编的四卷本《中国俄苏文学研究史论》、叶隽专著《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两部著作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术史研究模式——陈著立足于文学研究本体,而叶著更侧重于包括制度史在内的学科发展考察。这两种研究模式各有特点,互为补充又不可替代,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优秀范例。此外,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负责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经典作家系列”第一批项目已经结项,学者们对塞万提斯、歌德、海明威、雨果等作家的研究史进行了全面的回顾与总结。但目前为止,从整体性视野出发的学术反思却只有一部著作和一些单篇论文,与这一论题的重要性极不相配。早在1994年外国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上,会长吴元迈就提出要创立中国的“外国文学学”,而且认为首先要完成的任务就是“对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及当前的热点和重点、成就和问题、不同的学术观点和学派、发展的趋势和方向等,作出全面的客观的评估”,<sup>②</sup>直接肯定了整体性反思和学术梳理的重要性。但是多年来,这一呼吁却迟迟未能得到足够的响应。因此,本书将聚焦于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中这个非常重要同时又积累薄弱的基础部分,为更深入的反思提供线索。在此之前,需要考察先行者反思的路径和成果。

新中国成立之前,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积累不多,学科发展一直处于起步阶

① 有关学科历史,参见本书附录《“外国文学”课程设置与学科发展》。

② 吴元迈:《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外国文学——在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五届年会上的发言》,《外国文学评论》1995年第1期。

段,除了个别泛论外国文学研究的文章,并未出现专门的学术史著述。新中国成立以来,“外国文学工作”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学者们也在各个阶段做着类似“工作总结”的整体学术回顾。其中最早也最具开创意义的是载于1959年第5期《文学评论》的长文《十年来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工作》(署名卞之琳、叶水夫、袁可嘉、陈桑)。对学术史来说,此文最大的价值在于建构了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正统模式。由于历史语境的作用,这篇文章所做的学术回顾充满意识形态色彩,而且用阶级革命话语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历史进行了改写,表现出明确的话语建构意图。文章认为,“五四”以来的三十年中国只有外国文学译介,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鲁迅传统就是这一时期形成的唯一值得新中国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工作发扬光大的伟大传统。其特点是:“重视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重视欧洲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文学,特别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重视东欧被压迫民族的文学。”既注意作品的思想性,又注意作品的艺术性;为革命服务,也为创作服务。同时文章还提到,民国时期一些高等学府里的“学者”摆脱不了民族自卑感,与鲁迅传统格格不入,“袭取西方资产阶级的方式来研究西方文学”。文章将这种外国文学研究方式判定为非法,认为这种方式“肯定不会有什么建树”。在描述外国文学译介、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时,文章反复强调一个基本逻辑:只有在新中国,外国文学的译介和研究才真正繁荣起来。其用意不言而喻。准确地说,文章所作的全部肯定和批判都不是原创,而是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具体阐发。在梳理五十年来外国文学对于中国新文学和群众思想教育的影响和作用后,文章对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目标和方法论做出了总结和非常详细的指导,指出外国文学研究的任务主要在于“扩大(外国文学作品的)积极作用,消除可能发生的消极影响”,“运用正确观点阐明作品的思想意义、艺术价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同时在研究中要“参考我国广大读者群众的观感”。文章以杨绛、姚文元的论文为例,批评了研究中的两种偏差:残余的资产阶级治学方法的影响及庸俗社会学倾向。另外,文章还特别强调了外国文学研究的主体性问题,认为应该摆脱对苏联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依赖,从民族的角度做出中国人独有的研究。至此,文章成功地建构了“十七年”外国文学研究的理想范式,建构了新中国视野下的外国文学译介、研究历史。同时,它所提出的外国文学研究主体性问题,也是本学科的一个基本问题,在后来的学术反

思中被反复提起。

按照今天的学术史写作标准,这篇文章显然不能算是客观公允的学术总结,它充满着“十七年”的话语特色,对“不作阶级分析、抽空社会内容”的“西方资产阶级治学方法”保持高度警惕,予以严厉批判。从这种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出发,民国时期的许多外国文学研究成果都被打入“西方资产阶级治学方法”的另册,失去了进入学术史的权利。这种主观的意识形态过滤自然是本书应当极力避免的,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任何学术史叙述都无法避免主观性。虽然本书希望尽量客观地描摹新时期以来外国文学研究模式、话语转变的过程,尽可能地呈现其中的复杂和多元,而无意改写这段历史,无意赋予这段学术历史某种简单的规律性,却必然还是会出现扭曲、遗漏、不恰当的重视和不准确的判断。对此,笔者会随时保持一份警惕。

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外国文学界的整体性学术反思依然是星星点点,没有专著出现,大都不脱“工作总结”的模式。例如《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 3 辑(1981 年 8 月出版)载黄梅、钱满素、王义国文章《英美文学研究三十年》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英美文学研究的经验与失误,认为 50 年代的批评模式已显落后,必须开拓新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改变中国文学研究和外国文学研究分家的局面。《外国文学研究》1988 年第 4 期所载乔雨文章《中国新时期十年的外国文学工作实绩一瞥》总结了学界的重要研究成果,认为“外国文学研究工作的构架已经初步筑成”。新世纪以来,相关的学术史梳理开始出现在一些学术史丛书当中。《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年版)是较早涉及这一论题的著作。在该书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课题组负责、吴元迈执笔的《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 50 年》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外国文学研究的历程。文章采用的写法是分别总结各阶段、各国别的外国文学研究成果,稍加评价,最后做出总结。文章认为,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学界对苏联外国文学研究的全面学习和 60 年代之后的全面批判都失去了学术主体性;而新时期外国文学研究在重大进展的同时仍然不能完全做到“以我为主”,“仍在追随西方的‘新’观点,‘新’术语,‘新’时髦,缺乏距离意识”。与 1959 年那篇长文相比,该文的学术评价标准发生了一些变化。曾经因“资产阶级治学方法”而遭批判的杨绛文章《菲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在这里则被认为

是“思路、文风上另辟蹊径”。前后变化体现的,正是外国文学研究在不同时代方法论与价值标准的转变。文章并未系统建构全新的外国文学研究范式,但显然已经放弃了“十七年”正统模式中对“阶级分析”的强调,同时延续了对研究主体性的强调。

龚翰熊所著《西方文学研究》属于傅璇综主编的“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之一种,是外国文学研究界第一部全面回顾学术史的专著,具有开创意义。该书以先总论,后国别、思潮史的形式,梳理了晚清以来到新时期各阶段外国文学译介和研究的主要成果,论述了重要学人和外国文学学科的发展历程。该书用力最多之处是对新中国成立前外国文学研究史料的爬梳整理,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相当全面的资料。在梳理的同时,作者始终非常注重探讨学术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并且提出了外国文学研究“范式转换”的问题。但是作为“第一部”全面而又专门的著作,该书也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首先,是结构上的用力不均。全书用三分之二的篇幅回顾新中国成立前的学术史,对新中国成立后学术史的梳理有失简单。其次,书中对本学科方法论、价值取向以及整体发展的理论探讨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另外,由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主持、丁帆主编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文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涉及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四个学科,以时间为纲,“比较客观准确地概括了各个时期的重大科研项目、重大科研成果、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的理论讨论以及高校学校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成就”,为深入的学术史研究提供了较为准确全面的资料。

不可否认,在学术反思的潮流当中,外国文学界的脚步远远落后于其他人文学科。我们有太多纷乱的线索需要理清,太多思考的空白需要填补。本学科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它与中国文学研究、源语国文学研究有着怎样的关系?在百余年的学科历史当中,出现过哪些研究范式?这些范式与时代语境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互动关系?以往的外国文学研究体现了怎样的“问题意识”?外国文学研究如何在面对外国对象、运用西方方法的同时体现自身的主体性?诸多问题都应当得到整体性学术反思的深入考察。然而纵观外国文学研究整体性反思的文献,除了1959年那篇长文,大部分都是历史梳理与

成果罗列,更像是各国别、各语种学术成果的集合,而缺少对外国文学研究整体的深入反思,学理层面的讨论不够。换言之,现有学术史研究对外国文学研究“说了什么”交代得比较多,而较少探讨如何“说”及为何“说”的问题。尤其是对1978年以来学术发展的讨论,还有巨大的开拓空间。这个时期是外国文学学科恢复、重建与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三十年中,外国文学研究的数量与质量都远远超过之前的几十年,但学界对这一时段的整体回顾却用力不多。因此,本书将主要聚焦于这一时期。这当中,本书最为关注的问题则是外国文学研究在不同时期“言说”了什么,又是如何“言说”的,以及为何这样“言说”。即是说,本书希望再现外国文学研究如何在不同语境下建构不同的秩序,进而探讨不同秩序形成的原因。

## 二、分期依据

柄谷行人有云:“分期对于历史不可或缺。标出一个时期,意味着提供一个开始和一个结尾,并以此来认识事件的意义。”<sup>①</sup>本书的时段选择和分期依据主要参照了中国社会历史剧变的时间节点,因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一直与社会政治变动紧紧缠绕。在20世纪的数次社会文化转型中,对学术影响最大的是“五四”运动、新中国建立、“文化大革命”、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90年代的经济大潮。有学者将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划分为五个“话语演进时代”:1. 世纪初的十年,是传统转向现代知识话语时代;2. 20年代至30年代是自由学术话语时代;3. 40年代至70年代是革命阶级话语时代;4. 80年代是审美感性解放时代;5. 90年代为解构游戏话语时代。总体的基本方向是从传统本土话语走向张扬西学的学术话语。<sup>②</sup>还有学者将百年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三十年是“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期的学术话语“五四话语”虽然以多元共生为特点,其实以深受西方科学观影响的理性主义话语为主流;新中国成立后到“文革”的第二个三十年里,“阶级斗争话语”是唯一合法的学术话语;改革开放以来是第三个阶段,进入了所谓“当代话语”时期,话语来源有三:一是继承

① [日] 柄谷行人:《现代日本的话语空间》,董之林译,见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5页。

② 参见王岳川:《九十年代文化研究的方法与语境》,《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五四”时代的科学话语,二是西方当代理论话语,三是本土生成的新话语。<sup>①</sup> 还有一些类似的分期与两位学者的划分大同小异,或细或粗,都是围绕社会政治历史变动而展开。作为现代学术体系的一部分,“外国文学”走过了与其他人文学科大致相同的变化轨迹。“五四”时代,为“启蒙”提供话语资源;新中国成立后,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文革”中成为政治斗争武器;新时期再次充当引进先锋;90年代回归学术本位。本书选择1949年作为叙述的起点,并且将整个时段划分为“十七年”、80年代和90年代三大部分,基本对应了三次社会政治文化转型。必须承认,这一分期只是权宜之计,并不是针对外国文学学术历程的特点而设计,而是沿袭了学界对六十年来学术变化的一种普遍认识。

目前学界已经形成共识,认为1978年之后,伴随着中国社会语境的两次剧变,中国学界的学术话语也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是从封闭的政治指向话语转向现代性话语;第二次则是从现代性话语转向后现代性话语。<sup>②</sup> 许多学者都认同这样的看法:80年代文学研究模式从“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或者说是由社会历史批评转向审美批评。还有学者将80年代更细致地分为前后两段,认为前期的文学研究致力于扬弃阶级话语,从政治批判转向社会历史批评,后期才开始“向内转”;90年代之后,则是“由内向外”的转向,即由审美批评走向文化研究。<sup>③</sup> 本书并不完全认同学界流行的对于话语转型的一些具体判断,但是仍然沿用了上述分期方式,因为这样有助于考察外国文学研究与时代语境、其他人文学科的互动关系,从而突显“外国文学”研究的个性,有助于判断外国文学学科在整个学术体系中的价值。这样的分期方式表明,本书希望将外国文学研究话语转型这一研究对象置于整体学界的宏观视野下考察。

此外,虽然本书关注的主要是1949年以来外国文学学术历史的“断代史”,却依然希望保持对百年来外国文学学术历史的整体视野,将1949年之前的外国文学译介活动也纳入讨论之中。

① 参见高玉:《中国现代学术话语的历史过程与当下建构》,《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1期。

② 参见赵淳:《话语实践与文化立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③ 参见赵勇:《文化批评:为何存在和如何存在——兼论198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的三次转型》,《当代文坛》1999年第2期;周小仪:《从形式回到历史——20世纪西方文论与学科体制探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 三、研究视角

本书拟从话语转型的视角展开讨论。

中国学界最早出现的有关“话语转型”的讨论来自王岳川对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关系的辨析。这里出现的“话语”已经不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范畴。<sup>①</sup> 在《后现代文化艺术话语转型与写作定位》、《后现代文化现象研究——后现代知识与美学话语转型问题》及较晚发表的《中国九十年代话语转型的深层问题》中,<sup>②</sup> 他分别讨论了后现代艺术与美学的话语转型及 90 年代中国文化及学术的话语转型问题,论述中频繁使用“话语转型”一词,但并未对这一提法做出解释。随后出现的各种有关“话语转型”的讨论也并未对这一概念本身进行辨析。<sup>③</sup> 90 年代中期开始,在文艺学界对学科“话语转型”问题的热烈讨论中,讨论的焦点集中于如何对传统文论话语进行现代转换,如何对待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形成的既有文艺学话语传统,以及旧有话语系统转型过程中西方话语资源和本土语境的适配问题,“话语转型”仍然被作为无需解释的学界共识而使用。那么,话语转型究竟所言何事? 其实,这里的“转型”不难解释,主要的问题在于“话语”的所指很难明确。80 年代,“话语”还仅仅被语言学研究关注,从 90 年代开始,随着西方话语理论尤其是福柯、巴赫金思想的深入介绍,话语一词被中国学界广泛使用,出现频度越来越高,俨然已成为学术研究中的关键词之一,但其所指却一直非常模糊,大部分文章在使用这一词语时对其内涵语焉不详,任其意义随具体语境而变化。如此“乱象”并非全因使用者理解的偏差,而是“话语”本身的复杂使然。正如陈永国所概括的那样:“‘话语’是现代批评理论中历史相对较短、用法变化最大、使用范围最广、定义繁复多样、意义至关重要的一个术语。”<sup>④</sup> 即使是赋予“话语”极大理论空间的福柯,也不曾特别准确地描述其特征。“有时用它指所有

① “话语”一词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出现于学界,最初仅限于语言学领域内的讨论。

② 参见王岳川:《后现代文化艺术话语转型与写作定位》,《当代作家评论》1993 年第 4 期;《后现代文化现象研究——后现代知识与美学话语转型问题》,《文艺研究》1993 年第 2 期;《中国九十年代话语转型的深层问题》,《文学评论》1999 年第 3 期。

③ 例如阮炜:《传统学术话语现代转型的学术再思考》,《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4 期。

④ 陈永国:《话语》,见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年版,第 222 页。

陈述的一般领域,有时用作可以个体化的一组陈述,有时则作为一种有序的包括一定数量的陈述的实践。”<sup>①</sup>“从所体现的信仰、价值和范畴看,话语就是言语或书写,它们构成了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构成了对经验的组织或再现,构成了用以再现经验及其交际语境的语码。”<sup>②</sup>事实上按照福柯的意思,重要的不是这个词的本义,而是它在特定语境中的实践过程。此外,话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性,话语与权力的密切关系,也得到了他的高度重视。目前学界对话语的使用受福柯的理论影响较多。国内较早跳出语言学层面讨论“话语”问题的学者曹顺庆,则更突出“话语”作为“知识型、学术范式和思维方式”的一面:“所谓话语,是指在一定文化传统、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思辨、阐述、论辩、表达等方面的基本法则。”“话语是指在一定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中形成的思想、言说的基本范畴和基本法则,是一种文化对自身的意义建构方式的基本设定。”<sup>③</sup>不难看出,这与《词与物》中福柯对“知识型”的界定非常类似。

在笔者看来,尽管“话语”一词在具体运用中内涵变得越来越复杂,其实每一种理解都有其合理性。使用话语一词,意味着一种看待事物、看待研究对象的新方式,在这种视角下,哲学、文学、艺术乃至学术研究,无一不是一种话语建构和话语实践行为。从王岳川对90年代学术和后现代美学话语的探讨,到流行一时的中国文论“失语症”的判断,显然吸收了“话语视角”、“话语研究”方式的影响,将学术研究、美学与文艺学视为一种话语建构活动,他们对相应学术历史的反思也就具备了某种话语分析的色彩。同样道理,本书也将外国文学研究视为一种话语建构与实践活动,将百年来的外国文学研究历程视为一段话语转型的历史,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借鉴话语分析的方式,既有史的梳理——描述外国文学研究话语转型的历史,也有论的深入——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话语分析,尽量突出外国文学研究作为一种学科话语对中国文化主体的建构作用。这样的学术回顾方式将不再以史料和细节的堆积为目标,而是以问题为纲,更加注重研究对象与历史语境之间关系的考察。必须承认,从话语视角出发展开学术反思不是本书的

① [德] 曼弗雷德·弗兰克:《论福柯的话语概念》,《福柯的面孔》,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② 陈永国:《话语》,见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西方文论关键词》,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③ 曹顺庆等:《中国古代文论话语》,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8、26页。

创举,已经有许多先行者作出了贡献。<sup>①</sup>

笔者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理解“话语”的内涵。宏观话语,即是一个时代或者一种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知识型、学术范式、思维方式;微观话语,则是在这种范式下所产生的一系列范畴、概念、术语。相应地,话语转型也就具备两重指向,既指知识型、学术范式、思维方法的转变,也指具体范畴、概念、术语的转变。本书中出现的“话语”,既指话语表达的方式,也指话语表达的内容。换言之,本书所论“外国文学研究话语转型”,既指外国文学研究言说方式、研究范式、方法论的转型,也指外国文学研究言说对象、术语、范畴的改变。本书认为,20世纪前五十年是中国外国文学研究话语的创建摸索期。这一时期,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还在起步之中,外国文学译介活动显示了活力。阶级革命话语、启蒙话语、自由主义话语、理性主义话语、人道主义话语众声喧哗,多元共生;50年代至70年代,学界建构了一元独尊的阶级革命话语体系和独具中国特色的外国文学秩序;80年代是话语重建期,经过人道主义讨论和现代派论争,再次大规模吸收西方话语,扬弃了“十七年”确立的阶级分析话语传统,建构出重视20世纪西方文学、重视西方当代理论的外国文学新秩序。批评实践仍以社会历史批评为主要模式,形式审美研究与西方当代理论话语实践比例很小;至90年代,以英美文学及西方当代理论为中心的新话语模式逐渐强势,外国文学研究从方法到对象、术语、范畴都以英美学界为主要参照。但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并未确立一元中心的外国文学研究话语模式,尤其在近年来,西方话语的权威性屡遭质疑,以西方话语为导向的研究模式亦被诟病。学界在具体研究中虽以西方话语为中心,价值立场上仍然坚持文化主体性。

#### 四、研究范围

学术史的研究对象包括论著、高校课程、学术会议、论文集、论文、学术期刊等。本书将主要研究范围限定于国内五家外国文学学术期刊,同时根据需要兼顾其他学术成果。这一选择出于以下考虑:

<sup>①</sup> 例如黄念然的《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文论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赵淳的《话语实践与文化立场:西方文论引介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第一,本书以“外国文学研究话语转型”为研究对象,注重不同时期外国文学研究话语转变的过程,因此对时效性的要求很高。期刊文章和论著相比,由于篇幅短小,反应迅捷,论述集中,显然更具时效性,更能清楚展示学术话语产生、变化、消失与重建的过程,因而也就成为本书的必然选择。学术期刊之于学术史的价值学界已有定评,有学者如是说:“自从有了学术期刊,学术史就是由学术期刊介入的学术文本、学术事件、学术人物和学术团体活动的历史延续体。”<sup>①</sup>因此,本书将视野集中于这片“学术话语的集散地”,除了关注其中的学术文本,还将探讨相关的学术事件、学术会议对于学术史的意义。

第二,本书所选五家期刊包括:《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国外文学》、《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评论》,都是核心期刊和 CSSCI 来源期刊,曾经和正在本学科历史上发挥巨大作用,对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生产、流通、消费施加重要影响,记录并折射着本学科发展的轨迹,因此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特别适合本书的考察目标。三十年来,国内出现的外国文学专业期刊有三十余种,本书的选择标准有三:首先,是学术性。这是学术史研究的必然要求。因此就排除了《外国文艺》、《世界文学》等以作品为主的文学类期刊。其二,是综合性。综合类的学术期刊更能反映学术研究的全貌,因而《俄罗斯文艺》等单一语种的学术刊物不在考察范围之内。其三,是连续性。20 世纪 80 年代初,除了本书选择的五家期刊,学界也曾经出现过另外几份颇有影响的外国文学综合学术期刊,像《外国文学报道》、《外国文学欣赏》等。但它们都没能挺过 90 年代市场经济的冲击,以停刊退出了学术场域。本书所选的五家期刊,则是从 80 年代一路走来,完整地记录了三十年外国文学话语的变迁,可谓是 1978 年以来中国外国文学学科发展的明镜。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虽然划定了主要的考察范围,本书仍会根据需要扩大视野,将目光投向与论题相关的其他刊物论文、专著、教材与论文集。另外,本书虽然是在学术史的框架内梳理外国文学话语转型的过程和意义,有时也会跳出这一框架,将某些话语热点还原到更大的文化背景中去,结合这些话语在历史语境中的生成、运作过程,考察本学科相关话语实践的独特性,进而讨论本学科对于

<sup>①</sup> 谭学纯:《学术期刊:学术话语的集散地》,《光明日报》2005 年 2 月 24 日。